

简论罗明坚和利玛窦对近代汉语术语的贡献

——以汉语神学与哲学外来词研究为中心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摘要:汉语基督教哲学术语的创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开端可以追溯到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以罗明坚、利玛窦为代表的第一代传教士,重视文字传教,以语言为桥梁,以翻译为手段,促进了明清时期中西互识与会通。在他们所撰写的中文著作中创立了很多汉语宗教哲学词汇,因此系统梳理明清之际的汉语神学概念演变史,对于研究明清外来词、汉语基督神学以及世界汉语教育史等方面深具学术价值。

关键词:耶稣会;罗明坚;利玛窦;外来词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3)07-121-130

基督宗教传入中国始于唐代景教入华,公元 845 年,唐僖宗灭佛后景教也受到极大的影响,一般认为“元亡而景教亦与之亡”。景教创立了最早的汉语基督宗教术语,但这些术语大都没有流传下来,^①而真正奠基了汉语基督宗教术语的是明清之际的来华传教士和信教文人。

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极重文字之功,他们对文学流传在文明史上的作用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体现了文艺复兴后对文学理解的精神。利玛窦在谈到文字的作用时说:“广哉,文字之功于宇内耶!世无文,何任其愤悱,何堪期闇汶乎?百步之远,声不相闻,而寓书以通,即两人者

睽居几万里之外,且相问答谈论如对坐焉;百世之后人未生,吾未能知其何人,而以此文也令万世之后可达已意,如同世而在百世之前。先正已没,后人因其遗书,犹闻其法言,视其丰容,知其时之治乱,于生彼时者无已也。”在这样一种文明观的基础上,文字传教就成为他传教策略的重要手段,如他所说:“圣教之业,百家之工,六艺之巧,无书,何令今至盛若是与?故国逾尚文逾易治。何者?言之传,莫纪之以书,不广也,不稳也。一人之言,或万人听之,多声不暨已;书者能令无数人同闻之,其远也,且异方无碍也”。^[1]

两种文化相遇,以文字为桥梁,以翻译为手

作者简介: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文化交流史、传教士汉学。

^① 关于唐代景教研究参阅李之藻:《读景教碑后》,载阳玛诺:《唐景教碑颂正诂》,上海土山湾印书馆 1927 年版。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中国学社 1966 年版。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载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冯承钧:《景教碑考》,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三联书店 1996 年版。关于元代景教在中国流传,参阅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段,由此开始文化间的容受与理解,排斥与争论。这些来华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学时,在文字翻译上有两个领域较为重要,一是科技方面,^①一是宗教方面。对于来华传教士在科技方面的翻译研究较为深入,^②但对传教士在宗教哲学方面的翻译至今没有较为满意的成果。^③明清之际的汉语基督宗教文献是一个亟待研究的广阔领域,^[2]本文仅仅限制在明清之际最早入华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两人的中文著作和文献来考察汉语基督宗教哲学学术语的创立,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揭示出两种文化相遇的真实境遇。

一、罗明坚所创立的汉语基督宗教哲学学术语

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 1543—1607)是最早来华的耶稣会士,^④根据目前本人所掌握的材料,他留下的汉文文献和著作有:

(一)无标题汉语天主教短文。这篇短文是汉语手稿,无标题,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 Jap. Sin. 1—198 散页文献中,在这批文献中既有罗明坚打官司的告示状,也有他与明代文人士大夫唱和的诗歌,还有他学习汉语的手稿和词表,其中第 015v—016v 页是一篇用中文写成的关于阐述天主教教理的短文。关于这篇短文,我在《欧洲早期汉学史》一书中已经抄录出来,但尚未做学理上的分析。^{[3]55-56}

(二)《解释圣水除前罪》。这也是罗明坚的手稿,藏点和所藏位置与上面所谈的“无标题汉语天主教短文”相同。^{[3]55}

(三)《祖传天主十诫》^{[4]151-152}

(四)《圣教天主实录》^⑤

(五)汉诗三十四首

根据罗明坚以上的中文文献,我们经过筛选和分析,由罗明坚首次使用的天主教宗教哲学词汇有 50 个,具体如下:^⑥

亚当(1—Adam)^⑦,也物(1—Eva),妈利亚(里呀)(1—Maria), (耶稣作者注 1—Jesus) 圣水(2—*aqua benedica*), 前罪(2—*peccatum*), 天主(2—*Deus*), 天堂(2—*caelum*), 净首(2—*puritas originalis*), 魂灵(2—*anima*), 地狱(2—*paradisus*), 十诫(3—*decalogus*), 礼拜(3—*ritus*), 灵魂(4—4—*anima*)^⑧, 圣教(4—*Ecclesia*), 根因(*causa prima* 4—4—), 人魂(*anima* 4—7—), 净水(*aqua pura* 4—8—), 天主经(4—9—*oratio Dominica*), 普世(*universalis* 4—10—), 知觉(*intellectus* 4—16—), 世界(*mundus* 4—20—), 真理(*veritas* 4—20—), 祖公(*progenitores* 4—29—), 哑当(4—29—Adam) 也★(4—30—Eva), 噜只啰(4—33), 下品之魂(*anima vegetalis* 4—39—), 中品之魂(*anima sensibilis* 4—39—), 上品之魂(*anima rationalis* 4—39—), 五觉(*quinque sensus* 4—40—), 目司(*visus* 4—40—), 耳司(*auditus* 4—40—), 膜(4—47), 布革多略(4—47), 巴喇以(4—47), 赎罪(*penitentia* 4—48—), 诺耶(*Noe* 4—54), 啰哆(4—55), 梅瑟(*Moysis* 4—56), 热所(4—58), 耶稣—*Iesus*), 妈利亚(4—59—*Maria*), 十字架(4—63—*crux Christi*), 垂明(4—84—*amen*), 妈利呀(4—84—*Maria*), 圣图 *sacra imago* 5—6—)^⑨

二、利玛窦所创立的汉语基督宗教哲学学术语

利玛窦的中文著作有 13 部,这 13 部中文著作分别是:1.《交友论》(1595 年)2.《西国记法》(1595

① 利玛窦在谈到翻译《几何原本》之难时说:“且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强,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利玛窦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01 页。

② 黎南秋:《中国翻译史》,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安国风:《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08 年版。

③ 马祖毅等著《中国翻译通史》一书基本上对明清天主教传入中国的翻译鲜有突破性、展开性。任东升的《圣经汉译文化研究》,在明清之际的《圣经》汉译上基本上停留在二手文献,对一手翻译文献所知甚少,从而直接影响了研究的深度。

④ 关于罗明坚的研究参阅张西平:《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载《历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23 页。

⑤ 关于罗明坚《圣教天主实录》的版本变迁参阅张西平:《罗明坚:西方汉学的奠基人》,载《历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23 页。

⑥ 以下词汇对应的拉丁文,数字表示上面标出的罗明坚的著作。

⑦ 括号的数字表示罗明坚的五篇文献序号。

⑧ 括号中第一个数字表示罗明坚文献五篇文献的序号,第二个数字表示这一词汇出现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的页码。

⑨ 括号中的 5 表示罗明坚文献序号,6 表示是第六首诗。

年);3.《二十五言》(1599年);4.《上大明皇帝献土物奏》(1601年);5.《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6.《天主实义》(1603年);7.《西字奇迹》(1606年);8.《几何原本》(1607年)(此书是与徐光启合译的);9.《浑盖通宪图说》(1607年);10.《畸人十篇》(1608年);11.《乾坤体义》(1610年)^①;12.《天主约要》;^②13.《斋旨》。^③

对利玛窦中文著作的词汇,学界也有研究,最重要的论文是黄河清先生的《利玛窦对汉语的贡献》一文,但黄先生在研究利玛窦词汇时所用的原则是“作者对利玛窦的一些中文著译进行了考察。对利氏使用过的一些词语进行了挑选,选出了利玛窦创造的,现在仍在使用的汉语词语”,^[5]笔者这里对利玛窦中文著作的词汇选择与黄先生略有区别,一是,只要利玛窦使用过的属于外来宗教哲学词汇的,不管其是否流传下来,笔者一概收录;二是,这里主要侧重利玛窦所使用的中文西方宗教哲学词汇,他所创立的科技等新词语不在讨论之列。

黄河清先生在他的论文中所确定由利玛窦所创造,至今仍在使用的天主教新词有八个:

上帝(1-Deus),圣经(6-Scriptura),圣母(4-mater Dei),审判(10-iudicium),十字架(4-cruce Christi),耶稣(6-Iesus),造物主(2-),枕骨(2-os occipitale)。

笔者按照上面所说的原则,在利玛窦中文著作中择录出来的中文西方宗教哲学外来词汇有149,具体如下:

天主(6-7-Deus)^④,公教(6-8-pater),真教(6-8-),知觉(intellectus 6-9-),固然(6-9-necessitas),所以然(6-9-causa,见44页的解释),徒斯(6-9-Deus),造物(6-10-creatio),诸宗(6-12-origines),作者(6-120-causa efficiens),模者(6-12-causa formalis s),质者(6-12-causa materialis),为者(6-12-causa finalis),物

之内(6-12-in re),物之外(6-12-extra rem),物之私根(6-13),物之公本主(6-13),★悟斯悌诺(6-14),类之属(6-15),本体(6-18参阅72页-essentia),宗品(6-18),本品(6-18-principium),自立者(6-18-substantia),依赖者(6-18-accidentia),总名(6-19-nomen collectivum),上物(6-20),下物(6-20),语法(6-22 grammatica-),黑蜡(6-25),德牧(6-25),三品(6-26,参阅51页-tres partes animae),下品(6-26),生魂(6-26-anima vegetativa),中品(6-26-),觉魂(6-26-anima sensitiva),上品(6-26),灵魂(6-26-anima),推论(6-26-discurrere),目司(6-27-visus),耳司(6-27-auditus),鼻司(6-27-odoratus),口司(6-27-gustus),四行(6-27参阅5-216-elementa),自检(6-27-examen conscientiae?),公理(6-27-evidentia),形性(natura corporalis 6-28),神性(natura spiritualis 6-28),性之性(natura 6-28),超性之性(supernaturalis 6-28),司欲(voluntas 6-29),司悟(intellectus 6-29),无形之性(natura spiritualis 6-29),隐体(secretata 6-29),良觉(conscientia 6-31),外现(6-35参阅51页,73页),内隐(6-35),然(6-35),别类(6-38distinctio),同类(similitudo/similis categoria 6-38参阅72页),内分(6-39,见45页的内分,外分解释),辍齐拂尔(6-40),本分(6-43)同宗(6-45),同类(similitudo/similis categoria 6-45),同体(6-46),同宗异类(6-46),同类异体(6-46),同体异用(6-46),闭他卧刺(6-48),欧罗巴(Europa 6-49),外人(6-53),内人(6-53),拂郎祭斯克(Francescus 6-65),泥伯陆(6-65),厄袜(Eva 6-69),生觉(6-73),良善(virtus a natura 6-74),习善(virtus acquisita 6-74),公学(6-76),西痒学(6-76),五司(6-76),记含司(6-76-memoria),明悟司(6-76-ratio),爰欲司(6-76-voluntas),教化王(6-86-Summus Pontifex),罢市(6-86),四

① 朱维铮先生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将《理法器撮要》(1610年)收入其中,此文不属于利玛窦著,学术界已经有定论。“有些学者认为这本书题为‘泰西利玛窦撰’的抄本乃是一本伪作,虽然它对于我们理清明清时期西式日晷制作技术在中国的传承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版本学上看应不是利玛窦的著作。”见许洁、石云里:《抄本〈理法器撮要〉作者献疑》,载《或问(日本)》,2006年第11期,第15-24页;张西平:《百年利玛窦研究》,载《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

② 钟鸣旦、杜鼎克:《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利氏学社出版社2002年版。这是近年来所公布的为数不多的几篇利玛窦本人的重要文献。

③ 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祝平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台湾: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年版。这是近年来所公布的为数不多的几篇利玛窦本人的重要文献。

④ 括号中的第一个数字是利玛窦的中文著作序号,第二个是《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的页码。

圣录(quattuor evangelia 6-94),九重天(novem astra 5-216),月天(dies lunae 5-177),水星天(dies Mercurii 5-177),金星天(dies Veneris 5-177),日轮天(5-177),火星天(dies Martis 5-177),木星天(dies Iovis 5-177),土星天(dies Saturni 5-177),列宿天(sabbatum 5-177),宗动天(dies dominica 5-177),十二圣徒(7-251-apostolus),元徒(discipuli 7-251),伯多落(Petrus 7-251),圣经(7-256-sacra scriptura),外文(lingua 7-269-),界说(8-301 参阅 325 页),公论(opinio communis 8-301),所据(8-301 参阅安国风书),保禄(10-452-Paulus),形体(10-453-corpus),若翰(Johannes 10-456),万物之本(11-525),元行(11-526-elementa),亚物(12-91),海星(12-91),额辣济亚-圣母(12-91-mater Dei),亚玻斯多罗-使徒(12-95-apostolus),性薄禄-共具(symbolum 12-95),罢德肋-父(12-96-pater),费略-子(filius 12-96-),利斯督(基利斯督 christus 12-97-),宗撒责耳铎德-圣油(12-97-chrisma),斯彼利多三多-圣灵(Spiritus Sanctus 12-97-),厄格勒西亚-教会(12-99-Ecclesia),真福(12-104-beatus),司视(12-110),司德(12-110),司啖(12-110),司臭(12-110),体司觉(12-110),撒格辣孟多-圣迹(12-111-sacramentum),拔第斯摩-洗(12-111-ablutio),共斐儿玛藏-振也(12-112-confirmatio),共蒙仰-相取(communio 12-112),白尼登济亚-悔痛(paenitentia 12-113-),厄斯得肋麻翁藏-圣油终傅(extrema unctio 12-114)阿儿等-品级(ordo 12-114),本世(13-5),超性(13-9)。

三、罗、利所著《葡华词典》中汉语基督宗教哲学学术语

《葡华词典》是利玛窦和罗明坚共同创作的作品,^①笔者找出 15 个西方宗教哲学外来词汇,具体是:

誓愿(Ajurametarse),爱欲(Contentamento),天主生万物(Criador),生物(Criar),十字(Crux),教书(Dar lição),造化(Dita),无形神魂(Esprito),爱欲(Gostar delectar),爱爱欲(Gosto),西洋(Indi-a),西番(Indiano),地狱、阴府(Inferno),无尽、无

边无穷(Infinido),儒者、书生(Letrado),解教(Meter na cabeça persuadere),西方(Occidente),念经诵经(Orar),经布(Ordin),本(Original de liuro),源初(Origem),七政(Pranetas sette),许愿(Prometer fazer voto),历书、历本、历日、新书(Pronostico),电(Relampago),电光(Relampagar),日经、日晷、定时辰牌(Relogio do sol),时辰钟(Relogio di fero),闹钟(Repricar),回生、复苏(Reuerdecer),进香的(Romeiro),神(Siso Juiço),罪(Viço),有罪(Viçoso)。

四、罗明坚、利玛窦汉语西方宗教哲学外来词汇的语言学分析

外来词研究是近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我认为学术界对外来词研究的重视,除了纯粹的语言学原因外,主要是在中国学术日益融进世界学术的今天,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日益加深,而外来词是文化间交流的产物,如史有为所说:“外来词是语言接触的一种结果,而语言接触又以文化交流、文化接触为前提、为共生物。因此外来词也是异文化的一种存留。就此而言,它也许可称为‘异文化的使者’”。^{[6]3}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近一百年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整个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表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按照有的学者说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反向格义”,这样一来,如果重建中国文化和学术,如果说清楚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的变迁,近代概念史的形成和变迁就必须做深入研究,而展开概念史研究的基础是在语言学上对外来词的梳理。

按照沈国威先生的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胡以鲁在 1914 年的《论译名》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如何把握译词的问题。“传四裔之语者曰译。故称译必从其义。若袭用其音。则为借用语。音译两字不可通也。”^{[7]30}

王力先生也对外来词的研究做了原则的界定,他说:“借词和译词都是受别的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词;它们所表示的是一些新的概念。当我们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的时候,就把这种词叫做借词,也就是一般所谓意译;当我们利用汉语原来的构词方式把别的语言中的

^① 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该书对《葡华词典》医学词汇做了研究。陈辉:《论早期东亚与欧洲语言接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该书对《葡华词典》的语音系统做了研究。

词所代表的概念介绍到汉语中来的时候,就把这种词叫做译词。有人认为:音译和意译都应称为外来语。我们认为只有借词才是外来语,而译词不应该算作外来语”。^{[8]516}

罗常培先生通常将外来词称为“借词”,他认为近代汉语里的外国借词有四种:“(甲)声音的替代(phonetic substitution),就是把外国语词的声音转写下来,或混合外国音和本地的意义造成的新词。……(乙)新谐声字(new phonetic—compound)外国语词借到中国后,本国的文人想把他们汉化,于是就着原来的译音再应用传统的‘飞禽安鸟,水族着鱼’的办法硬把他们写成谐声字。……自从科学输入以后,像化学名词的铝(aluminum)、钙(calcium)、氨(ammonia)、氦(helium)之类,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丙)借译词(loan—translation)当许多中国旧来没有的观念从外国借来时,翻译的人不能把他们和旧观念印证,只好把原来的语词逐字直译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借译。……近代借词的许多哲学名词,像葛林(Thomas H. Green)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的‘超人’(übermensch),也就是所谓的借译词。描写词(descriptive form)有些外来词找不出相等的本地名词,于是就造一个新词来描写它,或者在多少可以比较的本地对象上加上‘胡’,‘洋’,‘番’,‘西’一类的字样,这就是所谓的描写词”。^[9]

史有为先生对外来词做了比较全面的概括,他说:“外来词,从字节来源的‘发明权’来看,他们是外来词,是由外民族首先发明并凝聚了词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是由外民族赋予了特殊的形式,或者是语音形式,或者是文字形式,而借入汉语之后却又经过不同程度的再创造,在语音形式和文字形式、语义内容上进行适合汉语的再创造,更重要的是他们多次使用于汉语中,从而融入汉语词汇,成为汉语的词。这就是我们对外来词的‘定格’”。^{[6]6}

近年来在如何对待意译词上有了新的提法,因为这类词完全是中文本身具有的,但在含义上赋予了外来的新的含义,有的学者将其成为外来概念词,并试图将外来概念词作为整个外来词的总称。^①

王力先生认为:“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比任何时期都多得多。佛教词汇的输入”^{[8]525}目前,对晚清以后的西洋外来词汇和东洋的外来词汇研究有了许多重要的成果,^②但对明末清初的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近代词汇学上的贡献研究明显不足。

本文结合以上的讨论,从三个方面将罗明坚和利玛窦的汉语西方宗教哲学外来词汇的角度做一个类型分析。由于论文的篇幅有限,本文无法对所罗列出来的全部外来词做外来词的类型学分析,同时,上面所罗列出来的外来词,相当一部分的拉丁词源尚未确定,这也为我的分析带来困难。因此,下面我只是对所罗列出的外来词中挑选出的代表性词汇做一个外来词的类型分析,尚不能对所有词汇做分析。

第一,罗明坚和利玛窦的汉语神学词汇中的音译词和混合词。

在汉语和外来文化交流之中,最早出现的新词是音译词,因为在最初的语言接触中外来语在汉语中尚找不到理想的汉语词汇,这样一般都采取音译的方法,“音译词是向读者表示外来单词语音的唯一方法”。^{[10]164}

混合词则是外来的音译词合本族词相结合而成,一般来讲,本族词表示音译词部分的意义。这两个方面其实都是上面所说的“借词”。

1. 亚当(1—Adam)^③,哑当(4—29—Adam);亚当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希伯来文为 Adham,罗明坚和利玛窦都是从拉丁文音译而来,这是中文文献中首次使用这个词。以后,在《老残游记》中开始使用这个词,鲁迅在《坟·摩罗诗力说》中

① “因此,我们给汉语中的外来概念词所下的定义是:汉语中表示本位外语语词的那种概念。”见《词库建设通讯》,香港中国语文学会,1993年第1期,第5页。

② 参阅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三联书店2002年版。钟少华:《中国近代新词语谈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近现代汉语新词语源词典》,2001年版。姚小平:《海外汉语探索四百年管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陈辉:《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姚小平:《罗马读书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

③ 括号的数字表示罗明坚的五篇文章序号。

也使用了这个词。^{[11]230}

2. 也物(1-Eva), 厄袜(6-69); 夏娃也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 希伯来文是 Hawwah, 罗明坚和利玛窦都是从拉丁文音译而来, 这是中文文献中首次使用这个词。罗明坚使用“也物”, 利玛窦使用“厄袜”。这个词后来也被成为“厄娃”, 在鲁迅的《坟·摩罗诗力说》中采用的是“夏娃”。^{[11]1590}

3. 妈利亚(里呀)(1-Maria), 马利亚是《圣经》中人物, 耶稣的母亲, 罗明坚这里从拉丁文音译而来, 这个词也在以后的中文中流传下来, 冰心在《南归》中就描写了马利亚。

4. 徒斯(6-9-Deus), 利玛窦在对天主教唯一神 Deus 的翻译上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在《天主实义》中他即使用了“徒斯”, 也使用了“天主”。但他的主要用法是“天主”, 这点从《天主实义》的书名可以看出。由于利玛窦在世时“礼仪之争”尚未发生, 利玛窦这样混同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在利玛窦去世后, 关于如何翻译“Deus”成了一个大问题, 由此形成了近四百年的“礼仪之争”, 并对中西双方的历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这个词没有在中国近代传统中保存下来, 但确是近代以来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影响最大的外来词。

第二, 罗明坚和利玛窦的汉语神学词汇中的意译词和仿译词。

马西尼指出, 在意译词和仿译词中很难看出外来词的痕迹, 因为意译词和仿译词与汉语本族词有两个共同的特征, 一是词的音和形有着语义的联系; 二是“语义单位的连接体是根据词素组合规则决定的”。^{[10]169-170} 因此, 用意译和仿译的方法来创造新词是汉语外来词的主要方法。意译词是指给原来的汉语词汇增加了新的含义, 它采用的通常都是汉语本族词。仿译词是指根据外语词汇来创造的词, 但却和原来的汉语词汇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对应, 汉语提供了仿译词的意义和句法结构。

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译词”, 如有的学者所说: “意译则要求译者对原词融会贯通, 然后在目的语中找出一个最大近似值”。^{[7]31}

1. 上帝(1-Deus), 《易经·豫》中“先王以作

乐崇德, 殷焉之上帝, 以配祖考”。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说“吾国天主, 即华言上帝。”“吾天主, 乃古经书所称上帝。”这是一个典型的意译词, 充分反映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

2. 圣经(6-Scriptura), 这是一个意译词, 《圣经》在中文文献中即指儒家的经典, 也可以指佛教或其他宗教的经典, 也可以特指犹太教的经典, 如《律法书》、《先知书》、《圣录》。自从利玛窦采用这个词特指天主教的经典以来, 就赋予了《圣经》新的含义, 这个特指也在以后的中文术语中流传了下来。^{[11]5006-5009}

3. 圣母(4-mater Dei), 如果说马利亚是个音译词, 那么, 圣母就是一个意译词, 在中国古代是皇太后的尊称。这个词也流传至今。

4. 公教(6-8-pater), 在汉语中指官办教育, 宋叶适曾说“臣闻朝廷开学校, 建儒管, 公教育于上……”^{[11]768} 现在中国教会认为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派别之一。音译加特力教, 意译公教, 也称罗马正教。中国人根据明末耶稣会传教士的翻译, 称之为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但至今没有人明确指出这个意译词是利玛窦所创。^①

5. 撒格辣孟多-圣迹(12-111-miraculum), 汉语中的“圣迹”一词有两层涵义: 其一是古圣人的遗迹, 《汉书》中有“往者秦为无道, 贱贼天下, 杀术士, 燔诗书, 灭圣迹……”其二是有关某宗教或其传说的遗迹。^{[11]5010} 这里利玛窦利用了中文“圣迹”表达了天主教的神学思想, 显然这是一个意译词。“撒格辣孟多”是“注释词”。

6. 罢德肋-父(12-96-pater), 利玛窦在《圣教约言》中说: “天主, 罢德肋, 译言父也。乃天主三位之第一位也”。显然, 译言“父”就是“圣父”。在中文中“圣父”是指太上皇的尊称, 《宋史》中有“既尊圣父, 亦燕寿母。”^{[11]5007} 用“父”或“圣父”来指称天主教中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一格, 显然, 这是一个意译词, 罢德肋是个“注译词”。

7. 斯彼利多三多-圣灵(12-97-), 在中文文献中“圣灵”有多层涵义, 《汉语大词典》将基督教涵义上的“圣灵”的出现说成在太平天国时代, 显然是晚了。^{[11]5012} 利玛窦这里所使用的基督教涵义上

① 百度百科中关于公教的解释还有另一种说法: “公教会”的“公”原文起源于拉丁语的 catholicus, 意思是“普遍的”, 翻译作中文“公”是取自“天下为公”的“公”, 因为天主教徒认为只有天主教会才是“全世界的”、“一般的”、“大众的”教会。他们选择这个名字, 是由于他们认为最初的教会是开放给全部的人, 而不是特定的种族、阶级或者特定宗派的。

的“圣灵”应为第一次。“斯彼利多三多”是个注译词。

第三,罗明坚和利玛窦的汉语神学词汇中的汉语新词。

马西尼认为汉语新词产生的传统方法是将外来语的新意归并到原有的汉语词汇中,或者将这种新意和已有词汇综合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创造的新词是语义新词。但“如果用汉字的重新组合来创造的新词,那么这种新词就是组合新词。在语义新词中,只是在词义或功能方面有一种变化。在组合新词中,新词的新意义和新功能全是创新的。”^{[10]182-183} 沈国威也说:“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们,为了有效地推进在中国的传教,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介绍西方知识的书籍。在他们的译书过程中,创造了为数众多的新词和译词。”^{[7]111}

1. 例如:

十字架(4—*crux Christi*),这是一个新词。十字架是基督教的精神象征,耶稣在首次预告苦难后即对门徒说:“谁若愿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谷八 34)。从利玛窦后来华传教士普遍采用这个词,^{[12]62}新教入华后也采用这个词,马礼逊在《英华词典》中收录。这个词在晚清后逐步流传下来,在清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天主教》中,在巴金和郁达夫的作品中都使用了这个词。^{[11]347-348}

2. 耶稣(6—*Iesus*),这是一个由罗明坚和利玛窦开创的新词。朱谦之先生《中国景教》一书,认为唐代传入中国的“景教”徒,在他们翻译为中文的“经文”中,把“耶稣基督”叫做“移鼠迷师诃”。据朱谦之先生分析,这个“译音”,来自宰利语(中古波斯语)*yiso msiha*。^[13]《汉语大词典》认为耶稣是希腊文 *Iesus* 的音译词,^{[11]347-348} 岑麟祥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认为拉丁文 *Jesus* 源于希伯来语 *Yeshua*。^[14]黄遵宪认为“耶稣”是音译兼译词,他说“假视天如父,七日复苏义为‘耶稣’,此假借之法也”。王闿运说:“竟符金桂讖,共唱耶稣妖”,他在文下注释说“‘耶稣’非夷言,乃隐语也。‘耶’即‘父’也,‘稣’,死而复生也,谓天父能生人也。”钱钟书在评价黄遵宪和王闿运的看法时说,“王望‘稣’之文而生议小异于黄耳”。^①

3. 别类(6—38*distinctio*),利玛窦在《天主实

义》中说:“夫正偏大小,不足以别类,谨别同类之等耳。正山。偏山,大山,小山,并为山类也”。^[15]拉丁语 *distinctio* 是区别的意思,用别类表示中文的区别这是一个新的外来词。

4. 拔第斯摩—洗(12—111—*ablutio*)这里的“洗”就是“洗礼”。利玛窦在《圣教约要》中说:“耶稣在世,将升天之前,谕命十二宗徒及以后主教者,凡世人初从圣教当依定礼用清水,祝咏经言,以洗确之。”拉丁文 *ablutio* 就是“洗礼”之意。《汉语大词典》认为此词出现在中文是在民国期间,显然时间上有误。这个词应为新的外来词,拔第斯摩是“注译词”。

“洗礼”在中文有另一个表达:付洗,领洗(*Baptise, by the Romanisits, in Chinese called*)。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最早在《英华词典》中使用了这个词,后来严如煜(1759—1826)在《三省边防备览·策略》一文中在介绍基督教时讲到领洗“进教者无论男女必要领洗”。马礼逊认为这两个词来自天主教的概念,“领洗”被明末清初的来华天主教采用,^{[12]31,186}“付洗”未被采用,当时天主教用“付圣洗”。^{[12]31}应该说,最早使用这个词的是利玛窦,以后逐步从“洗”发展到“洗礼”、“付洗”和“领洗”,这两个词都属于意译词。

5. 亚玻斯多罗—使徒(12—95—*apostolus*),使徒,耶稣的使徒。这是利玛窦首先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后来马礼逊在《英华词典》第6册I,第30页用(*Apostle, Apostle of Jesus*),在基督教意义上,使徒指被基督派往全球传播福音的人。瓦罗词典没有这个词。汉语没有这个词,这是一个汉语组合新词。“亚玻斯多罗”是注译词。

6. 宗撒责耳铎德—圣油(12—97—*chrisma*),这个词出现在《圣经》出埃及记30章22—25节,天主教在圣周(星期四)由主教祝圣的橄榄油有三种:(1)用于慕道者候洗期。(2)用于圣洗、坚振及圣秩(神品)圣事等。(3)用于病人傅油圣事。“圣油”需要经过主教祝圣之后才能被使用。涂圣油是表示“圣灵恩赐的印记”。这是在刚受洗后的施行的,为的是使新入教者坚定对三位一体真神的信仰。这是一个新词,“宗撒责耳铎德”是一个注译词。

① 参阅钱钟书:《管锥篇》(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61—1462页。以及第5册,1986年版,第114页。

五、小结

对西学东渐的研究在历史学范围内已经做得比较深入,在对明清之际的西方语言学传入的研究上,在语法、语音、方言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唯独对外来词的研究较为薄弱。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推动笔者开始注意这方面的研究:

第一,学术界对近代以来从日本传来的外来词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例如沈国威先生的《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一书,系统地梳理了近代以来中日之间在汉语新词的交流和影响,但是在近代从日语所传来的外来词中有两类,一类是直接从日语所创造的词汇传入的,一类是日本在吸收了中国的新词后又返回中国的,如马西尼教授所认为的“回归借词”,他说:“这样一类词:它们原来自汉语中某一很特殊的场合里使用,后来在日本得到了广发的传播,最后又回到了中国”。“回归借词”,马西尼认为有两种,一种是中国语言中原有的词汇,另一类是明清来华传教士所使用的词汇传入日本,又返回中国语言中的。他认为,对于“明清时期创造的回归借词,旁证材料极少”。^{[10]178}

明清来华传教士的中文著作传入日本,应该在日本产生影响。日本学术界为对国内所藏的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相关书籍作一个全面了解,在昭和 60—62 年(注:1985—87)对全国的国立大学图书馆和都道府县立图书馆进行全部调查,这个调查所指的耶稣会士是 16 世纪至 18 世纪到中国的天主教系传教士,并非仅限于所谓的耶稣会的成员,也包含隶属于其他会派的人。因此,鸦片战争以后的新教徒系的传教士不在研究对象之内。但是,徐光启和李之藻例外,包含在研究对象之内。这次调查最终调查图书馆数是包括私立大学图书馆和市立大学图书馆等在内的 100 家,其中找出现存相关书目的图书馆 37 家,总件数 866 件,他们最后出版了《耶稣会士相关着书译作所在地调查报告》^①

本次调查中已确认的相关书目,有 189 种,866

件,现在从内容大致分为历算科学技术类、宗教格言类、地理地志类 3 个领域,从刊本、抄本的角度分为原刻(17 世纪)、后刻(翻刻、丛书收录的书目)、抄本三类,总结如下表(但是,其他的 11 件除外)。

	种数	原刻	后刻	抄本	合计 (注:件数)
历算科学技术类	79	127	120	184	431
宗教格言类	93	66	225	45	336
地理地志类	17	9	42	37	88
合计	189	202	387	266	855

从日本学术界的这个不完全的调查可以看出,目前在日本藏有明清之际的来华传教士的西学汉籍有 189 种,886 件,如果对日本的图书馆展开全面调查,实际的数量会超过这个数量。这样,通过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初步看到西学汉籍在日本的流布。这些中文书籍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新词有何影响?哪些在晚清时又传回中国,成为马西尼所说的“回归借词”?至今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尚未见到研究。

第二,明末清初汉译西学的特点。

明末清初的西学著作翻译主要是三种形式,第一类是传教士口述,中国文人笔录。这类汉译西书的典型代表就是《几何原本》,利玛窦在序言中说的很清楚,他早有翻译此书的想法,但“才既菲薄,且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当徐光启提出让其口述,他来笔录的办法后,利玛窦十分高兴地说:“先生就功,命余口述,自以笔受焉,反复辗转,求和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稿”。

第二类是署名传教士所写,但实际上文人润笔。例如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天主实义》写于万历三十一年,即 1603 年,《几何原本》写于万历三十五年,即 1608 年。他在《几何原本》中清楚地说他写作有困难,五年后就能完全自己写作?这实

① 这次调查的机构“其国立大学及附设研究所 31,私立大学 9,都道府县立图书馆 28,市町立图书馆、机构 18,国立机构(内阁文库、日本学士院)2,私立图书馆、机构(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蓬左文库等)12。原本是指在调查主要国立大学、各都道府县立图书馆的全部,但是很遗憾,能够对两者都进行调查的都道府县只有 27 个,占全体的不到 6 成。另外,此次对国会图书馆、东京天文台、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伊能忠敬纪念馆(千叶县、佐原市)也就相关书籍进行了确认,但是没有完成全部的调查,不作为此次调查报告范围。”择自《耶稣会士相关着书译作所在地调查报告》,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周娜帮助我翻译的,在此表示感谢。

实际上不太符合实际。他在《天主实义》序言中说：“承二三友见示，谓虽不识正音，见偷不声，固为不可；或傍有仁恻矫毅，闻声与起攻之。竊乃述答中士下问吾侪之意，以成一帙。”这里没有明说，实际上是他口述，也写了初稿，后面文人加以修改。

第三类是传教士自己所写，期间文人也可能帮助，但基本是传教士所写。例如利类思(Louis Baglio, 1606—1682)所写的《超性学要》，这本书实际上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约1225年—1274年3月7日)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的翻译，这是一本很艰辛的西学著作，从目前的译本看，主要应由利类思完成。

这样，将明末清初汉籍西学著作的翻译形式仅仅归结为传教士口述，文人笔录尚不能概括明末清初西学翻译的全貌。同时，也增加了研究明末清初西学译本的复杂性。上面我所列出的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这些中文著作署名都是他们自己，但肯定有中国文人帮助。明末清初期间中国人懂拉丁文的人少之又少。罗文藻，又名火沼，字汝鼎，号我存，拉丁名 Gregorio Lopez，他是第一位中国人的主教，也到菲律宾去传教，懂西班牙文，但至今尚不知他留下关于西学的中文著作。^{[16]144-161}另一位从罗马培养出来的中国神父郑玛诺，回国后不久就病逝，也没有留下西学的翻译著作。^{[16]187-191}

对中国学术界来说，首先应该对明清之际的外来词做一个系统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有一定的研究，如上面提到的黄河清对利玛窦的研究，但对西方宗教哲学词汇的研究论文极少，^[17]正是从这样的角度，笔者感到系统梳理明清之际的西学宗教哲学外来词汇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第三，近年来关于汉语神学的讨论成为中国基督教学术界一个重要的问题，刘小枫在《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中提出“汉语基督神学在明代已经出现，中国士大夫中第一批基督徒(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在汉语思想的织体中承纳了基督信理，并与儒、佛思想展开辨难”。^[18]在如何看待汉语神学的问题上，学术界有较大的争议，何光沪认为：“汉语历史神学应该把从景教到也可温教(元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从利玛窦到赵紫宸，以

至后来用中文著述的神学思想纳入自己的视野，列为历史神学的研究对象”。^[19]实际上刘小枫做自己所理解的汉语基督教神学主要在近15年，对在建立汉语基督教神学时是否回到明清之际的汉语基督教思想与概念，他并不明确。^①实际上，在我看来，汉语神学的建立主要在明清之际，不了解这段历史是无法说明基督教进入中国后汉语化的实际历史过程的，但由于目前明清之际的汉语神学文献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从而使学者忽略了这段历史的价值。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汉语基督神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在罗明坚和利玛窦时期就已经确立了。因此，系统地梳理明清之际的汉语神学概念演变史是学术界必须展开的一项工作，本文就是这样一个初步的尝试。

最后，西人汉语学习的历史和近代汉语变迁的历史的重合性。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罗明坚和利玛窦在创立汉语神学和哲学词汇时，是一个学习摸索的过程。罗明坚的部分中文材料我们甚至可以说成他汉语学习过程中的“中介语”，例如，他对马利亚的译名就有：妈利亚(里呀)、妈利亚、妈利呀，对耶稣的译名就有两个，这说明了他是—边学习汉语，—边发展汉语，创造汉语神学词汇的。这揭示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学习的过程和汉语本身的发展变迁过程不是分离的，而是一体两面的一个历史过程。

我在《世界汉语教育史》—书中认为，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学术意义，其中第二点就是谈的这个。我指出：“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将直接推进对汉语本体的研究。文化间的交往必然带来语言间的交往，当汉语作为外语在世界各地被学习时，学习者会不自觉地受到来自母语的影响，从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来看，母语的作用会直接影响到学习者的汉语学习。但很少注意到，学习者的这种习惯力量也同时推动着语言间的融和。”

王力先生说：“中国语言学曾经受过两次外来的影响：第一次是印度的影响，第二次是西洋的影响。前者是局部的，只影响到音韵学方面；后者是全面的，影响到语言学的各个方面。”^[20]这两次影响的发端都是从汉语作为外语学习开始的，佛教

① “明代至清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位置，在人类学方面(礼仪之争)和理念方面(耶儒之争)。当今的汉语神学是否值得重新回到这一位置，并重新起步？”李秋零、杨熙南主编：《现代性、传统变迁与汉语神学》(上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的传入,印度的僧侣们要学习汉语,要通过学习汉语来翻译佛经,结果是直接产生了反切。王力先生说,反切的产生是中国语言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是汉族人民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表现。西方语言学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得更为突出,来华的传教士正是为了学习汉语,编写了汉语语法书,如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为了读中国的书,写下了《汉语语法》;传教士们为了阅读中国典籍,发明了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传教士们为了以中国人听懂的语言来布道以及翻译圣经等宗教书籍,创造了一系列的近代新的词汇,包括至今我们仍在使用的大量的词汇。这说明,当一种语言作为外语来被学习时,它并不是凝固的,它也会随着学习的需求而不断发生变化;反之,学习者虽然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但学习者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学习者也会对自己的目的语产生影响。语言间的融和与变迁就是这样发生的。直到今天,现代汉语形成的历史并未完全被说清,而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则可以推动汉语本体的研究,可以直接推动近代汉语史的研究。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明清之际中国官话问题的讨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明清之际的官话是北京话,但最近在传教士的很多汉语学习文献中发现,他们的注音系统是南京话,这些传教士在文献和他们的著作中也明确地说他们学习的官话是南京话。不仅仅是西方的传教士的汉语学习材料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在日本的汉语学习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日本江户时期冈岛冠山所编写的《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话便用》、《唐音雅俗语类》、《经学字海便览》等书,六角恒广研究了冈岛冠山的片假名发音后,明确地说:“这里所谓的官音是指官话的南京话”。^[21]这说明作为汉语学习的文献直接动摇了长期以来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结论。

至于在语法和词汇两个方面就有更多的文献和材料说明只有在弄清世界汉语教育史的情况下,才能更清楚地研究好近代中国语言学史,甚至可以说,随着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原有的中国语言学史的结论有可能将被重新改写。^[22]

参考文献:

[1](意)利玛窦.西字奇迹[M]//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

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68.

[2]张西平.明末清初天主教入华史中文文献研究的回顾与展望[M]//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3]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5]黄河清.利玛窦对汉语的贡献[J].语文建设通讯,2003(74):30—35.

[6]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7]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M].北京:中华书局,2010.

[8]王力.汉语史稿: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27—29.

[10]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11]汉语大词典:上卷[Z].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

[12]W. South Coblin. Francisco Varo's Glossary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vols. LIII/1 and LIII/2[M].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2006:62.

[13]朱谦之.中国景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4]岑麟祥.汉语外来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418.

[15]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8.

[16]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7]徐光台.明末西方“范畴论”重要语词的传入与翻译:从《天主实义》到《名理探》[M]//姚小平.海外汉语探索四百年管窥.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18]刘小枫.现代语境中汉语基督神学[M]//李秋零,杨熙南,主编.现代性、传统变迁与汉语神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9]何光沪.汉语神学的方法与进路[M]//李秋零,杨熙南,主编.现代性、传统变迁与汉语神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0]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1](日)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M].王顺洪,译.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22]张西平.世界汉语教育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13.

[责任编辑:翟宇]